

日本战后70年编委会编

日本战后70年

轨迹与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战后70年编委会编

日本战后 70年

轨迹与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日本战后70年编委会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61-7135-6

I. ①日… II. ①日… III. ①日本—现代史—研究 IV. ①K31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3344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特约编辑 王称 马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40.5
插页 2
字数 661千字
定价 9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名单

-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吕耀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
胡 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
徐 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
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外交研究室主任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

序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46年“铁幕演说”到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40多年的冷战终告结束，但这并没有带给人们最初期盼的宁静与祥和，由两极变为“单极”的世界继而陷入“无极”、失序之中。在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冷战的遗产”依然浓重残留，零和观念、冷战思维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国际关系现实同时存在，形势严峻而复杂。

战败投降70周年之际的日本较之当初更是判若云泥。从奉“吉田路线”为圭臬，集中精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跻身七国集团参与国际事务，再到80年代提出“国际国家”“政治大国”发展目标，日本在自我认知上完成了从战败国家向“西方经济优等生”、国际体系重要参与者的蜕变。同时，日本与战后秩序、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远未理顺，而历史问题至今仍是影响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对未来世界以及自身在其中位置的预测颇为乐观，在日美同盟陷入“漂流”造成压力、国际政治权力诱惑的双重驱动下，日本正式开始将对冷战后期既已萌生的“正常国家”化目标的追求付诸实施。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主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迫使日本不得不面对现实，重归借壳日美同盟谋求自我发展的轨道。1992年，中国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同期日本股市、楼市双双暴跌，经济增长由此进入下滑通道。与此同时，日本社会政治进入转型重构期，呈现“年年选首相、岁岁出新人”的政坛奇观。日本对“正常国家”化的追求受到国内因素的羁绊，但步伐没有就此停歇，同时追求目标的路径选择有所调整。除借壳日美同盟外，在战后传统的“经济外交”之外寻求出路，成为此后一直延续且日渐显性化的战略趋向。从21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内阁借力助美反恐通

过“有事法制”，到 2015 年安倍晋三内阁强推“新安保法”，日本亟欲通过政策松绑释放政治能量，战后以来的安全防务政策由此出现本质性蜕变。

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地缘相近，历史渊源悠久，惟其如此，彼此关系厚密而复杂。在今天的东亚乃至亚太，中国崛起、日本转型、美国“转移”之间频密互动，成为影响地区形势走向的主要自变量。中日关系步入博弈与合作并行发展、同步深化的“新常态”，同时面对战略磨合、利益调整、心理调适等几方面的课题与压力。日本、中日关系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重要性既包含正面的、建设性的，也时常体现为负面的、破坏性的。基于对日本走向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针对日本社会、政治、外交特别是安全防务政策的加速蜕变，中国日本学界推出了大量论文、专著，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也有一些失之零碎，缺乏整合是美中不足。

作为研究战后日本的专职责任机构，在李薇所长的精心设计与倾力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规划 2015 年度科研工作阶段开始，即把《日本战后 70 年：轨迹与走向》的撰写与出版列为创新工程重点项目。进入 2015 年，日本研究所先后举办了七场专题系列学术研讨会。其中六场按学科领域设计，以五个研究室为单位，邀请 20—30 名中国、日本知名专家，与本所研究人员一道，分别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安全及日美同盟各个角度集中深入探讨。8 月 16 日，作为前六场会议的集大成，日本研究所成功举办了有中日两国 80 余名知名专家出席的《战后日本 70 年：轨迹与走向》国际研讨会。进而，又从与会中国专家的几十篇学术论文中严格遴选，构成《日本战后 70 年：轨迹与走向》的主干部分。

《日本战后 70 年：轨迹与走向》不仅要求每一篇入选论文研究深入、观点精当，而且更注重全书的体系完整性与逻辑严密性。经过作者长年积淀与七场会议的磨砺，本书入选论文的观点得以高度凝练；经过精心编纂设计，每篇论文之间相互照应、彼此互补，全书得以主题明确、主线明晰、浑然一体。从这一角度看，这本篇幅达 60 余万字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对国内日本学界近年来关于战后日本研究成果所做的一项系统化工程。

经过严格遴选而进入本书的 30 余篇论文依序从日本的国家战略、自我认知、经济社会、外交安全、对华关系等展开论述，层层递进、渐次深

入，不仅从历史纵坐标、“70周年”这一深阔视域系统梳理了日本战后发展轨迹，而且从时代横坐标、对当前日本政治外交及中日关系进行了横切面式的全景透析。本书作者队伍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日本研究重镇，展示了当今中国日本学界的高端水平，特别是集中了“60后”“70后”及“80后”相对年轻的优秀学人，其构思、观点、行文多有破旧创新之处。

《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凝结了几十名日本问题专家长年潜心研究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70周年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能在这样一个不长的时间周期内、拿出如此厚重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也唯有依靠集体攻关才可能做到。

《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的编撰与出版，既是为厘清战后70年来日本发展变化的脉络，从中发掘出决定、影响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与要素，更是为分析当前、预测未来提供史实与理论的依据。洞察当今、预判未来，仅凭历史的经验无疑是不够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与时空条件下，传统的规律、要素往往会出现变异、变形，同时，各种新变量层出不穷、不断介入。但是，对这些规律、要素的把握无疑又是最基本而必需的。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讲，我们更愿意将这本《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看作是未来不断深化中国学术界日本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杨伯江

2015年12月1日

目 录

序	(1)
---	-------

政治与外交

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杨伯江(3)
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及成因	张建立(20)
战后日本选举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系变迁	徐万胜(44)
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变迁	张伯玉(60)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	吴怀中(92)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军事正常化”的发展	卢 昊(107)
日本对美国认知的变化	
——战后 70 年的轨迹与当前的选择	归泳涛(130)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	吕耀东(149)
战后 70 年日本的东南亚外交	
——经济外交的开启与展开	白如纯(165)

经济与社会

战后 70 年日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徐 梅(179)
战后 70 年日本科技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冯昭奎(206)
战后日本产业的发展演进	
——赶超成功、模式困境与战略转型	张玉来(230)
战后日本社会 70 年的变迁：现代化论视角的总结	周维宏(263)
战后日本社会运动的演进和特征	胡 澎(279)
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的新宗教	王新生(302)
现代与传统：战后 70 年日本家庭的变化	李 卓(322)

战后 70 年日本的人口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冯文猛(334)
战后 70 年日本老年医疗护理制度的变迁	丁英顺(350)
战后日本老龄产业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	田香兰(370)
日本战后 70 年的公营住宅制度	周建高(385)

思想与文化

战后日本的思想辙迹：表象的和实际的	韩东育(413)
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战后日本的“民族”与“民主”	孙 歌(450)
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	
——以战后初期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为中心	刘岳兵 王萌(470)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思想	邱 静(491)
战后日本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超克论”批判为中心	唐永亮(519)
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逻辑与脉络	
——以《教育基本法》和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董炳月(538)
战后日本 70 年来的智库建设	刘少东(561)

中日关系

战后中日关系的轨迹、特征与走向	吴怀中(581)
战后 70 年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影响	张建立(611)
战后日本“中国形象”的演绎与重塑	吴光辉 肖珊珊(630)

政治与外交

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杨伯江*

内容提要 1945 年日本战败，宣告了其“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1947 年《日本国宪法》施行，1951 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标志着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战败投降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的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直至目前的“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阶段。这一发展演变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于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日本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以及路径选择的改变。纵观 70 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追求“大国化”的历史基因一以贯之，从未消退，这促使我们就日本未来走向做持续深入的思考与探析。

关键词 战后 70 年 日本国家战略 吉田路线 正常国家化

国家战略，一般是指国家为达生存与繁荣之目的，不拘平时与战时，全面调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加以统筹运用的“科学”与“艺术”。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包括形势判断、确立目标、制订计划、政策落实等主要环节，涉及以自身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以内外形势研判为前提的实施路径的选择等关键要素。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基于对过去的反思，结合国际格局变化与国内现状，确立了新的国家战略，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同步调整。据此，本文将战后 70 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尝试对主导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作出分析，以期在

* 作者简介：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此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日本的未来走向。

一 “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

1945 年日本战败，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失败，也宣告了战前“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日本面临近现代史上继“明治开国”之后又一次道路抉择，而主题是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在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后，从 1946 年吉田茂首次组阁，到 1947 年《日本国宪法》施行，再到 1951 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

（一）日本走“经济中心”导向型和平发展道路是现实的选择

日本明治维新后持续在海外进行军事扩张，对邻国实施侵略，通过战争掠夺殖民地，获取原材料和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彻底粉碎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日本不仅丧失了军事力量，也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军事立国”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①从国内看，日本战败后经济衰败，民生凋敝，民众普遍向往和平，和平主义思潮势头强劲，“军事立国”路线为主流民意所不容。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有待处置的战败国日本重新走“军事立国”道路。在东西方冷战帷幕拉开之前，削弱日本、防止其东山再起，是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这一时期，吉田茂等保守派政治家认识到，不仅亚洲邻国，即使“盟国似乎都把日本看作是破坏和平的好战民族”。因此，“为了使盟国消除这种误会，并承认日本国民是爱好和平的国民，在（1946 年颁布的）宪法中列入放弃战争的规定是非常恰当的”。^②

现实严格限定了日本统治集团只能在和平主义的方向上构思新的国家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将实现国家经济自立确定为最优先课题，主张放弃军事力量而专心发展经济，提出以“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吉田路线”。1947 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开始施行《日本国宪法》，从此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这部和

^① 1957 年 9 月，岸信介内阁期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称日本在战后失去了 46% 的“国土”。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军国主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韩润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21 页。

平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① 和平宪法成为保障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高法律依据，也使得战后日本得以集中精力专心发展经济，国家战略得以从战前的“军事立国”平稳转向“经济中心”。

（二）追随与借助是该战略的基本思路

这一阶段日本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获得发言权。为此，从吉田茂开始，战后历届内阁高度重视经济复兴与增长，先后制定实施了以“倾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产业复兴政策、确立“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充分利用美国扶植下的有利外部环境拼抢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内的各种发展机遇。在对外战略层面，随着冷战帷幕的拉开，处于美国单独占领之下的日本确立了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基本路线。此时的日本因战败而丧失了主权，但围绕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现实又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的思考与筹划从未停歇，并就此与美国进行了频密沟通与讨价还价。

作为战后日本与美国等 48 个战胜国片面媾和的产物，1951 年 9 月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标志着日本最终选择加入西方阵营，并将以此为立足点，致力于重返国际社会、开拓海外市场。而此后几小时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则意味着日本在通过《旧金山和约》解决了战后领土边界与国际地位问题的基础上，进而以牺牲部分主权（允许美军基地驻留、镇压日本“暴乱与骚动”）为代价，换取了被占领状态的结束，并与美国化宿敌为盟友、被纳入后者的全球与地区战略轨道，从此仰仗其庇护。此后，1960 年 1 月《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标志着日本沿既定方向再向前迈进了一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不仅使日美关系的“对等性”有所增强，也使条约从单纯军事性质扩充为兼具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质。新条约第二条专门就经济合作作出规定：日美“将通过加强两国的各种自由制度，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制度所

^① http://web-japan.org/factsheet/ch/pdf/C09_consti.pdf.

根据的原则，并且通过促进稳定和福利的条件，对进一步发展和平和友好的国际关系作出贡献。两国将设法消除在它们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矛盾，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①

（三）在迅速恢复与壮大经济实力方面，该战略取得非凡成功

在“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指引下，日本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实现腾飞。在经过大约十年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后，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据统计，从 1946 年至 1975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 11 倍，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10% 以上。其间，从 1960 年至 1970 年，GNP 年均增长率达 11.3%，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 16%。1968 年，日本 GNP 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至 1972 年，日本 GNP 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 9.4%，至 1974 年，出口总额占到 7%。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但增长速度仍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对于这一阶段的日本而言，与美国结盟使其得以兼顾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将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国力的战略思路与获得安全庇护、重返国际社会、获得技术转让和扩大出口市场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世界分裂、东西对抗、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使得日本借助与西方阵营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利用美国的战略需求，通过安保体制将国家安全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走“重经济、轻军备”之路，将节省下来的防务开支用于经济建设成为可能。与美国结盟，不仅意味着获得安全保障，也意味着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便利化，意味着日本可以直接、充分地利用来自美国的全方位支持——从资金援助到技术转让到市场开放。吉田茂就曾提出：“为了不断地发展经济，必须吸收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而想要扩大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则只有以世界各国中经济最富裕、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为对象。尤其是，日本如果考虑到为今后国内建设所必需的外资的吸收问题，特别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宫泽喜一在分析日美结盟的战略收益时也强调：“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考虑，美国不能置日本于真空状态而不顾；日本则需要重建今后的经济。从双方的立场看，唯有

^①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jyoyaku.html>.

选择日美安保条约才是上策。”^①

（四）在追赶美欧的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实现后，该战略面临调整压力

战后日本“走上了日美结盟的道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国的力量，并不惜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对冷战格局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使日本在冷战格局下定位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这种有效利用他国力量为本国国家战略服务的实例是极为罕见的”^②。“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在较短时间内造就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几乎与此同时，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来自日本国内的质疑，面对调整的压力。概言之，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该战略本身在成就经济腾飞的同时，也给日本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制约。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认为，“吉田路线”体现了“商人式的国际政治观”，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当时日本国内对“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的主流评判。在把旧金山片面媾和视为吉田外交头号功绩的同时，高坂认为“吉田路线”的保守倾向扼杀了战后日本人民选择新价值体系的可能性，认为虽然媾和从总体上看利大于弊，但日本也为此付出了与东方阵营对立、冲绳为美军所控制、对华政策追随美国等代价。此外，日本国内围绕自卫队是否违宪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这也是吉田忽视社会民意、仅执着于经济发展目标而留下的败笔。^③

第二，日本在积聚了相当的经济能量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吉田路线”没能就此给出答案。^④高坂认为，经济优先主义虽然使日本实现了繁荣，但对美从属却束缚了日本外交的独立性，国际活动空间变得狭窄，国民的精神目标也因安于现状而逐渐丧失。

^① 转引自富森睿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吴晓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 页。

^② 田庆立：《战后初期日本国家战略的三大转变及其原因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③ 参见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④ 实际上，这一时期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构成促其反思“吉田路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1969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表明美国将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要求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义务——“美国将恪守对亚洲盟国的条约义务，同时希望由亚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责任，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直接推动了日本加紧思考在安全军事上“何去何从”。

“虽然拥有了如此巨大的国力，日本却在迷惘应将之运用于何方。”高坂警示日本社会，《日美安全条约》不可能永世不变，日本只有增强自身国力，才能避免一旦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后难以自立的局面。为此，他主张日本以“海洋国家”为标准，超越作为岛国的过去，以积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①高坂的观点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精英层对社会经济发达而精神空虚的担忧，以及对增强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期待。^②但客观而言，这一问题可能原本就不在“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的设计范围之内，而是在该战略引领日本实现长足发展之后所必然面对的问题。换言之，“日本向何处去”问题的提出，恰恰寓意着“吉田路线”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即将功成身退。日本在呼唤新的国家战略。

二 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奏响了国家战略调整的序曲，至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最终明确将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新的战略目标。日本新的战略诉求主要通过要求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构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国内进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酝酿修宪等对内对外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不过，在这一阶段，与“正常国家”化这一新目标本身的鲜明度相比，日本新国家战略的展开尚缺乏体系完整性，政策路径选择的主体部分尚未完全敲定。

（一）“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推动日本诉求升级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继续领先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983 年，日本贸易黑字超过联邦德国、资本输出超过英国，此后长期保持着世界第一贸易黑字大国、经常收支黑字大国和资本输出大国地位。1985 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同期美国沦为世界最大海外债务国）；1987 年人均 GNP 超过美国；1988 年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1989 年人均 GNP 达到 24499 美元，列世界第一位。1986—1988 年，日本

^① 高阪正尧『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社、1969 年、174 頁。

^② 参见张帆《高阪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